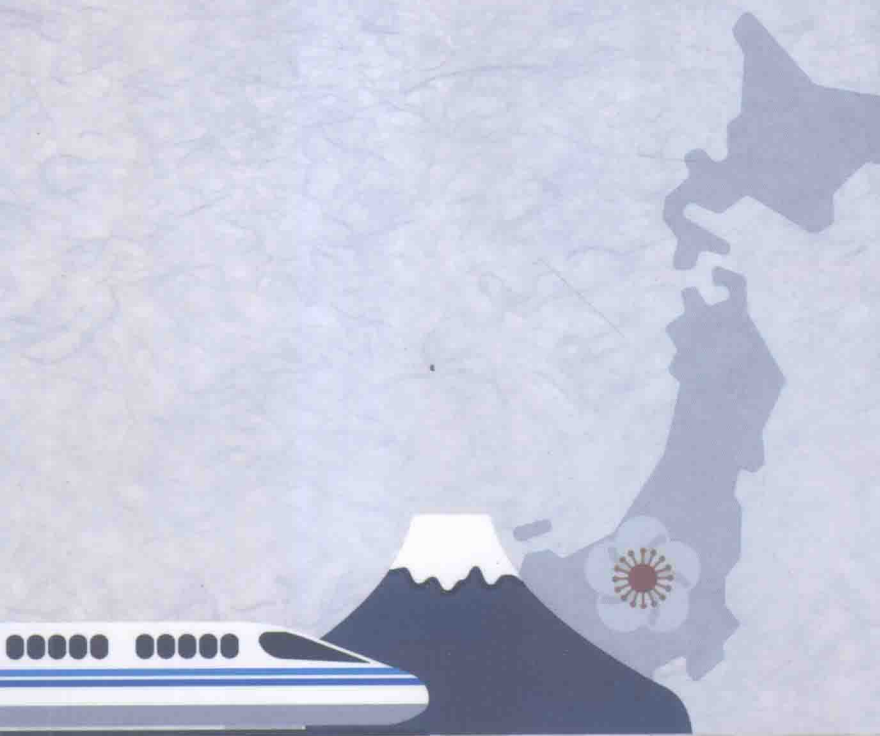


日本政府的 经济政策研究

陈友骏 / 著



世界·经济出版社

日本政府的 经济政策研究

陈友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 / 陈友骏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12-5225-1

I. ①日… II. ①陈… III. ①经济政策—研究—日本—2012—2014 IV. ①F1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5321号

责任编辑

张 萱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

Riben Zhengfu de Jingji Zhengce Yanjiu

作 者

陈友骏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24¾印张

字 数

379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225-1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背景.....	1
第二节 本书的写作目的与分析对象.....	10
第三节 本书的视角及理论框架.....	14
第四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结构.....	17
第一章 安倍政府治理经济的构想与困境.....	21
第一节 悲观主义视角的经济治理哲学.....	23
第二节 “安倍经济学”的构建及主要特征.....	28
第三节 “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困境.....	34
本章小结.....	43
扩展阅读.....	45
第二章 “第三支箭”的失效与“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矛盾.....	48
第一节 理论视角下的结构性改革.....	48
第二节 “安倍经济学”倡导结构性改革的动因.....	52
第三节 “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	54
第四节 “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	62
本章小结.....	73
扩展阅读.....	75

第三章 日本能源战略的嬗变及安倍政府的能源政策分析.....	77
第一节 “去核电”引发日本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政治博弈.....	78
第二节 安倍政府“去核电”政策的主要动因.....	82
第三节 日本能源战略发生相应调整.....	87
第四节 “去核电”催促安倍政府中东政策的嬗变.....	92
本章小结.....	95
扩展阅读.....	97
第四章 日本能源困境下的电力系统改革.....	99
第一节 日本电力系统改革的现实进程.....	99
第二节 日本电力系统改革的动因分析.....	106
第三节 日本电力系统改革的发展趋势.....	115
扩展阅读.....	121
第五章 日本知识产权新政及发展趋势.....	123
第一节 日本政府持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123
第二节 日本推动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因.....	132
第三节 日本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	143
扩展阅读.....	146
第六章 “积极和平主义”与安倍政府的外交理念分析.....	148
第一节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现实表现.....	149
第二节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形成动因.....	155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掩饰下的相关政策走向.....	161
扩展阅读.....	165

第七章 安倍政府的“新五项原则”及对东盟政策的调整.....	167
第一节 “新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安倍政府的政治举措.....	168
第二节 安倍政府加速发展对东盟的经济联姻.....	180
第三节 安倍政府强化对东盟外交的动因解剖.....	190
第四节 安倍政府“新亚洲主义”的局限性.....	194
扩展阅读.....	201
第八章 日美能源合作的新动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204
第一节 安倍政府提速对美能源合作进程.....	205
第二节 日美能源合作的利益驱动新机制.....	212
第三节 日美能源合作的战略性突破及发展趋势.....	219
第四节 日美能源合作的对华影响.....	225
本章小结.....	228
扩展阅读.....	230
第九章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安倍政府的政策应对.....	232
第一节 战后日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33
第二节 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轨迹梳理.....	241
第三节 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特征.....	247
第四节 安倍政府应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举措.....	251
本章小结.....	254
扩展阅读.....	255
第十章 安倍政府对台经济政策动向及日台关系走势.....	258
第一节 安倍政府对台经济政策的新动向.....	258

第二节 安倍政府对台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动因	264
第三节 日台经济勾连及日台关系走向	270
本章小结	275
扩展阅读	276
参考文献	279
附 录 2013年中美日三国相关大事记	319

绪 论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背景

2012年末日本鹰派政治家安倍晋三时隔五年再任首相一职、组阁执政，标志着日本政坛再度回归自民党保守势力的统治之下。安倍内阁启动之后，对内、对外基本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执政风格，同时审时度势、推陈出新，竭力把安倍式的改革推向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保等各个领域，以求重新塑造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强国”形象。

经济上，安倍政府主推“安倍经济学”，意图借助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促使日本经济尽快行至复苏轨道，并为政治、外交、安保等领域的相关改革积累必要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安倍经济学”实则是旨在改革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增加日本经济增长点的系统工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但是，由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在战后长期的运行过程中业已形成难以撼动的僵化体制，再加上人口减少、产品出口竞争力下滑、国际经济环境疲软等综合因素的叠加，致使“安倍经济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

政治上，首相安倍晋三进一步强化了其在自民党内及政府内阁中的主导力及影响力，尽可能地保持党权、政权个人独揽的垄断状态。不仅如此，作为保守政治家的领袖人物，安倍晋三刻意通过直接或间接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否定左翼政治家的历史认识等，从而进一步拉近其与自民党及非自民党保守政治势力之间的亲近感，并凸显其右翼政治家的本色。而且，由于安倍晋三采取了一系列保守化的政治举措，致使日本政坛完全被保守势力所掌控，内阁人事安排及相关政策的协商及制定等均折射出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

对外关系上，安倍政府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外交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介日本“和平主义”的畅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倍政府所谓的“地球仪外交”战略布局上，稳固并发展对美关系显然是其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其发展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双边、多边关系的重要支撑。在此基础上，安倍政府把东盟、蒙古、印度等日本的一些周边国家及地区视为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积极投入外交资源，强化双边合作关系，意图构建“感情上亲日、政治上挺日、经济上需日”的地区合作圈。

军事上，安倍政府显然有违和平宪法的意志，大张旗鼓地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及军事作战力，并不断向海外输送相关军事人员及军事设施，加强日本在地区及全球范围的军事存在感及影响力。实际上，在首相安倍晋三及政治保守势力看来，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日本真正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基本前提。但囿于和平宪法的制约，战后日本的多届保守政府唯有选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操作方式，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挺进，争取最大限度地创造日本军事伸展空间。但有别于战后的历届政府，安倍政府在日本军事扩张的议题上可谓是“胆子大、步子宽”，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甚至觊觎架空或绕过和平宪法及民主制度的约束，营建无限制的军事发展环境。更有甚者，安倍政府肆意渲染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刻意制造中国军事实力的正常增长对地区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的假象，并以此为烘托，强调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综上所述，安倍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可谓是全面出击，意图通过强势的政治主导力为日本找寻到“转型”之机，改变泡沫经济崩溃后始终深陷颓势中的日本形象。尽管如此，安倍政府的努力并没有收获预期的成果，反而给它的相关工作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遭遇严重掣肘，在野党的反对、利益集团的抵制、民众的不懈抗争等频频成为安倍政府推进体制改革的“拦路虎”。

另一方面，任何政府的相关政策都必须兼顾外部环境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三、在地区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强国而言，其执政的任何领导人自然更需要认真且谨慎地思考地

区及国际局势的客观因素。有鉴于此，安倍政府的上述政策及相关举措同样无法脱离金融危机后国际局势急遽转变的大背景，而且，作为具有一定地区影响力的国家，日本安倍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成为了推动地区局势及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更为深刻地理解安倍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动机及考虑，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本书写作时期的国际时局，这里简要地梳理一下安倍政府所面对的地区及国际环境。

第一，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版图开启新一轮深刻转型，与此同时，大国关系、南北关系以及地区关系等亦同步性地驶入转型轨道。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呈现出多股势力的激烈博弈，其中，尤以守成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的角力最为引人瞩目。这里，作为守成势力的代表之一，美国当仁不让地充当着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其不仅意图捍卫这一群体在协调国际政治、治理世界经济中的支配性地位，同时竭力确保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传统霸权。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组成的新兴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发展，并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彰显出足以令人信服的协调能力及合作意愿，而且最终促成金砖机制（BRICS）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迫使以G7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大国势力逐步放弃其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垄断特权，后者同时以更为平等、更为直接的方式与新兴势力共同协商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治理规则。以此为背景，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新协商机制不断涌现，全球政治格局及大国关系加速转型、调整，促使全球社会进入崭新的变革时代。

时代变革意味着机遇与挑战的并存，它对生存于全球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及地区均提供了相对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但关键问题在于各自是否能成功把握住这种变革的机会，实现趋利避害、自主发展。一直以来，战后的多届日本政府均以实现政治大国为外交的根本目标，但不可否认，它们却未能改写日本在世人眼中“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普遍印象。而且，尽管日本参与国际政治的积极性及出境率颇高，但实际的政治领导力及潜在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致使其始终无法由经济大国晋级为政治大国。或许日本也在等待变革的大背景，等待能够帮助其顺利实现政治理想的时代性机遇，但无论怎

样，这一次的日本、至少是安倍政府并没有在这场危机之中等闲视之，前文所述的种种政策及措施足以表明其对这次金融危机“正面且积极”的认识。

第二，美国强推“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及核心领导力。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在经济上对美国造成严重创伤，同时也对其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不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同时也波及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具体而言，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就长期垄断国际政治及世界经济，并借此积累起巨大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经济利益，有些也已经以不同的形式转化为美国的软实力。但是，滥觞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阻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构成掣肘，致使许多国家纷纷把指责的矛头直接伸向美国，甚至有些观点从根本上否定美国所崇尚、推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时间，以美国的自由经济发展模式为重要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全世界唾弃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为范本的“北京共识”，后者也转变为国际社会争相讨论的宠儿。当然，经济模式的讨论同时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领域，从这一层面来看，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及摒弃又是对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否定或淡化，而这又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去美国化”的趋势。

面对金融危机后的战略困境，美国国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以一种无奈但客观的态度承认了自身综合国力的相对衰退。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世界霸权的孜孜追求，并觊觎通过部分重要的地区性战略调整，继续维护并扩大其在地区及全球层面的核心领导力。另一方面，与其他的地区经济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呈现复苏势头，进而升格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随着国际经济的天平逐渐偏向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重心亦逐渐倾向于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等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局势的变化，也是更好地维护或扩大自身在这一地区的传统优势及战略利益，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战略关注及资源投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局势转变，为部分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及发展机

遇,但总体而言,随着这一战略的落实与演进,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反而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混乱,稳定发展的地区局势正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威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而且,更为发人深思的是,究竟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还是维护或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答案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里暂且不讨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真实用意。但美国在经历了世纪性金融危机之后就急速抛出平衡战略,至少说明美国亦在寻求、探索新的战略性嬗变。而且,尽管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日本在其亚太战略中的新功能及新定位,但至少可以表明美国亟须稳固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亟须培养一批值得信赖、可以信赖的亚太伙伴国。因此,这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其喜闻乐见的重大利好消息。而且,无论从战术上还是战略上,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都有利于日本拓展对外关系、扩大地区政治影响力、增强地区经济管控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更有利于日本重新调整战后日美关系的基本格局,为其实现真正对等、平等的日美关系提供不可多得的积极条件。

第三,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客观图景,同时两国经济规模的悬殊对比日益趋深,导致中日在综合国力、地区及国际影响力等不同领域的实际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排名在2010年发生历史性的位置互换,即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而日本跌至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嗣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并且通过“调结构、稳增长、促转型”等一系列经济结构优化措施,促使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高速、合理的运行区间。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加速摒弃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并大步流星地向节约型、技术引领型且可持续型的新模式靠拢。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继续保持一年上一台阶的基本趋势,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为40.15万亿元,2011年的数据为47.31万亿元,2012年又增长至51.95万亿元,2013年达到56.88万亿元,2014年达到63.64

万亿元的历史新高^①。再加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增长因素的叠加，中国GDP的实际规模业已超过10万亿美元，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总之，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进步依然是显著的，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与中国经济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相比，日本经济一直未能走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留下来的阴影，经济增长区间始终徘徊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的非理想状态。而且，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激增了日本经济走向复苏的困难，甚至在心理上催生出复苏无望的悲观主义情绪。实际上，尽管过去的多届日本政府在经济上不断“推陈出新”，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把日本经济重新扭转至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但事与愿违，扩张的财政支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等，这些被日本政府及执政的政治家们反复使用的经济措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良性效果。不仅如此，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各种所谓的改革措施之后，似乎逐渐产生了“免疫力”，丝毫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大幅度的增长。就以2010年度至2013年度的经济数据为例，2010年度日本的实际GDP总量为512.42万亿日元（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2011年度的数据约为514.16万亿日元（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2012年度的实际GDP为517.58万亿日元（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而2013年度的实际GDP为529.25万亿日元（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②。由此，仅从实际GDP的总量变化就不难发现，日本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观，而且这其中还必须考虑日元大幅度的贬值、超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等相关的利好因素。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按美元兑换日元一比一百的汇率换算，日本经济的总体规模略超过五万亿美元，这与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接近一倍的落差，二者的经济差距可见一斑。

如上所述，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保持着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固有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② 日本内閣府：「国民経済計算（GDP統計）」（http://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sokuhou/files/2014/qe142/_icsFiles/afieldfile/2014/08/08/gaku-jfy1421.csv）。

态势，即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强与日本经济的持续走弱折射出鲜明的对比特征，并且二者之间的规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这也导致日本曾经试图重新反超中国经济的想法彻底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可见性表象相比，政府的反应能力和执政能力、政策性效果、政策推进机制的合理性与高效性等非可见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且更为关键，同时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刻画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日本经济改革失败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并从根本上解释了中日经济在21世纪初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原因所在。

当然，经济数据仅从一个方面阐明了中日实力差距逐渐扩大的事实。但是，它虽是片面性的，但也是全局性的，更是本质性的。很快地，中日两国在经济实力上的扩张性差距就已经传导到对外经济、地区政治以及地区安全等其他领域，甚至在大多数地区主导权的中日角力和竞争中，均出现了中国完全占优的压倒性态势。

面对邻国——中国的日趋强大、而自身却深陷相对性衰退的窘境，日本方面显然表现出一定的焦躁和不安，甚至有部分保守主义分子提出干脆把中国视为假想敌，以便为下一阶段的复苏与发展确定清晰的追赶目标及防范对象。这里暂且对此言论不做任何评论，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保守势力发出的这一信号至少说明中国的国力增强及影响力上升已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潮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这也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安倍政府的相关政策之中。以下就日本国内的相关反应做简要梳理。

首先，日本国内悲观主义的情绪在持续深化，同时原先所持有的对华特殊优越感亦在不断弱化、销蚀。毫无疑问，战后的日本的确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整个国家从战争结束后的万象凋敝、百废待兴逐步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以说，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模式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经典的、教科书般的研究范本。与此同时，日本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重要契机，鼓励日本企业大举对华输出资本及技术，为日本企业的海外创业及二次发展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华日资企业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技术及人才资源，也在中国经济急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庞大的经济利益及扩张资本。期间，中国以诚恳且虚心的态度向日本学技术、学管理、学

运营，日本也保持着热忱、友善的态度向中国传授相关知识及经验。由此，一方面中日之间逐步形成这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经济领域“师徒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在对华经济合作问题上日趋显现出明显的心理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此后日本对华经济上的心理优势不断向其他领域扩散、展开，并最终逐渐演变为包含有经济实力、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全面的对华优越感。但诚如前文所言，中日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日本对华经济的传统优势不仅消失殆尽，反而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进而加剧了原先因经济优势而产生的对华整体优越感的减弱、消亡。

其次，日本社会对创新精神的追求日渐式微，安于现状的满足主义精神状态促使其整体趋于保守化、封闭化，个别领域甚至出现激进化、极端化的危险倾向。与进行整体性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相比，当下日本社会的多数群体似乎更愿意接受墨守成规式的发展路径，换句话说，就是以传统的取代现代的，以经验的取代创新的。在此背景下，日本社会基本重新回归至保守主义的发展路线。

就以经济为例，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复苏之路。而且，尽管此后的历届政府及诸多政治家们也是想尽了不同办法，试图改变日本步入颓势的境遇，但理想最终还是与现实渐行渐远，日本的国内经济也逐步由萧条走向“深度萧条”。面对被冠之以“失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或者是其他中小党派都没有拿出进行彻底改革的宏大方案。不仅如此，经济政策依然沿袭着20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长期所积累下来的陈旧经验，即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政府干预，促使经济重新走入复苏轨道。所不同的是，与此前历届日本政府相比，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在货币及财政双管道上呈现出规模性的急剧膨胀，而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安倍经济学”只注重短期内的复苏问题，并没有关注较长时期的战略性经济发展，甚至更没有设想政策失败或经济没有实现复苏的应对问题。有鉴于此，“安倍经济学”缺乏实质性的经济改革措施，也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而一味追求政策规模及政策数量的表现凸显激进主义的特征，

这反而容易把日本经济的未来带入更为痛苦的深渊。

另一方面，日本的外交政策亦完全充斥着激进的保守主义色彩，“向美一边倒”的基本原则重新成为日本外交思维的主导性前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向美一边倒”是指导日本战后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竭力推崇的基本外交模式，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借助日美安保同盟扩大日本外交及安全的影响力，同时防范周边国家对日本造成的威胁或潜在威胁。日本民主党的鸠山内阁曾一度尝试扭转“向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构建对等的日美关系，但迫于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最终败下阵来，改革派的外交努力也宣告彻底的失败。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间差距日益扩大促使日本社会心理发生重大改变，而且，为继续维持中日间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及实力对比，日本国内寻求外部驰援的呼声愈发强烈，这就为保守势力的重新掌权及日本外交重心再次完全倒向美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层面来看，安倍政府的“向美一边倒”是日本逃避外交战略创新的故意之举，更是日本保守主义谋求对华均势的特殊伎俩。

再次，日本对华积极合作的传统思维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强的对华竞争性思维方式。实际上，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差距的日益扩大，日本在对华态度上愈发表现出既希望合作、同时又害怕合作的矛盾心态。换言之，“以邻为伴”与“以邻为壑”，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性思维模式成为日本社会决定对华态度的主要取向。毋庸置疑，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以邻为伴”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主导性原则，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蓬勃发展以及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性衰退，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逐步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的身上，同时也掺杂了更多提防与防范的成分。可以说，2010年中日两国经济规模发生历史性的位置互换成为日本国内社会彻底改变对华思维方式的直接导火索，嗣后，“以邻为壑”明显地压过了“以邻为伴”，成为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思路及指导原则。而且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国有化”钓鱼岛以及其他针对中国的矛盾激化，都可以被视为日本对华关系的指导性风向标发生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升级。

尽管如此，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内的对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被

竞争性思维所垄断，其中有占不少比重的且有望重新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的意见及观点仍坚持认为，应当保持对华合作的基本趋势不动摇，同时中国巨大的发展优势及潜在的市场容量是日本经济实现复苏的重要依托。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等，塑造了日本安倍政府上台执政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以及对华心理的转折性改变等成为主导及影响安倍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内因。这些内外部因素共同构建了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深入分析日本政经新嬗变以及安倍政府相关政策举措的重要切入口，凸显本书写作的特殊时代意义。

第二节 本书的写作目的与分析对象

战后波及面最广、损害程度最深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深陷困境的日本经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同时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一次尝试变革的机会。但肇始于2009年9月的日本民主党领导的三届政府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次变革的大好机遇，也未能实现日本政治的历史性转折。更令人失望的是，民主党的失败并没有唤醒日本国内社会改革意识的迸发，却给予保守政治势力更大的活动空间及政治影响力，并最终促成自民党安倍政府的再度上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首届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所倡导的战略性变革在日本的内部及外部均遭遇了强烈反对，并最终在无奈、彷徨中偃旗息鼓。嗣后，菅直人及野田佳彦两届政府为了避免重蹈鸠山政府的覆辙，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政策理念及执政风格中注入保守主义色彩，并“竭尽所能”地缩小与保守政治势力之间的距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主党在执政后期已然完全转变为保守势力主导的政党，它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等也已趋同于自民党时代曾实施的保守主义政策。

由是观之，安倍政府的上台有其偶然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民主党执政后期的种种努力与其说是在拖延执政时间、抑或是创造凤凰涅槃的机会，毋宁说是在为安倍政府的上台作嫁衣，构建日本整体趋近保守的内部政治环境。但是，安倍政府并没有沿袭民主党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政治路线